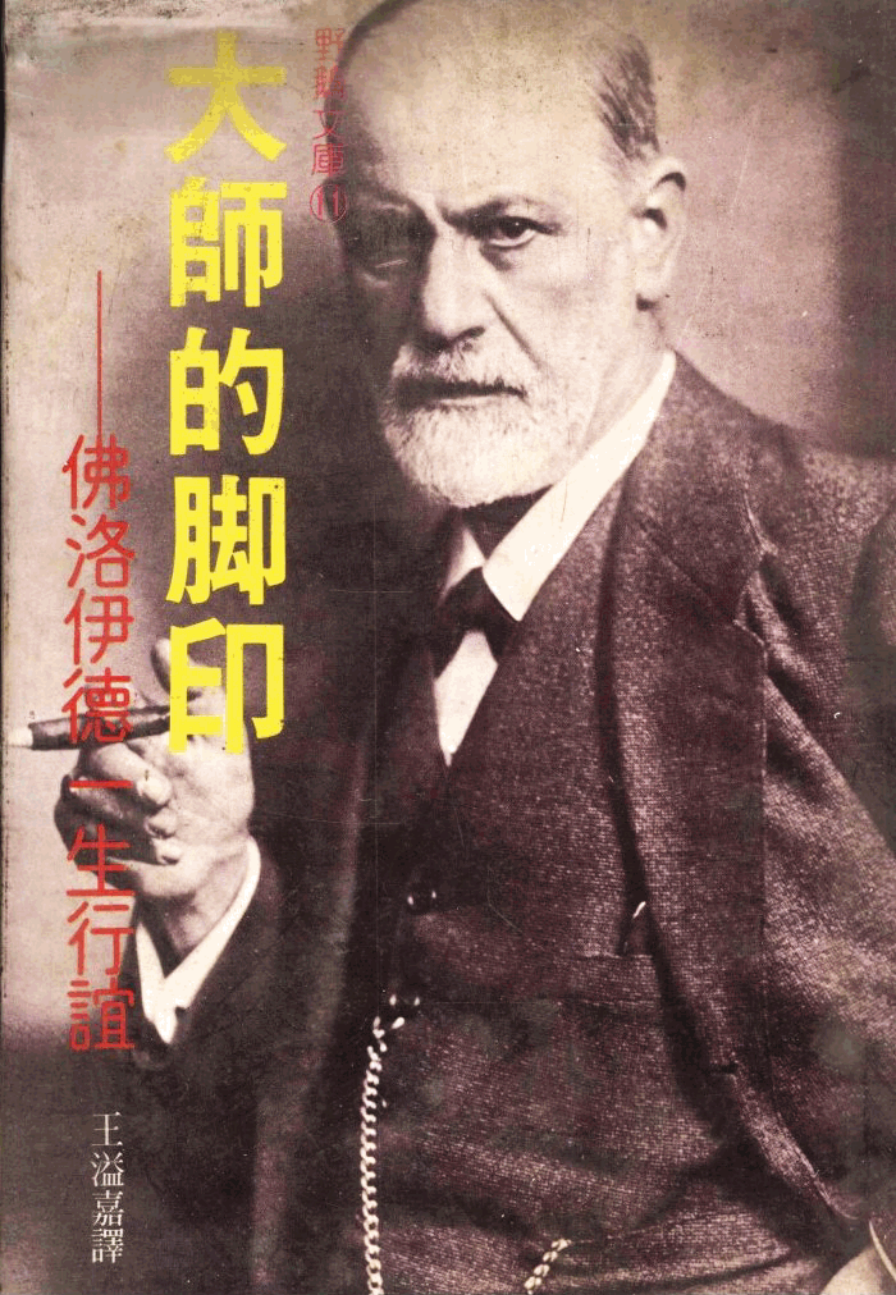


野鵝文庫 ⑪

大師的脚印

佛洛伊德一生行誼

王溢嘉譯



大師的脚印

——佛洛伊德——
一生行誼

王溢嘉譯

野鵝文庫 ⑪

野鵝出版社印行

每當我遇到一個人時，
我知道總有一種難以形容的衝動，
會使那個人低估了我。

——給未婚妻瑪莎的信，一八八六·一·廿七

目錄

譯序

佛洛伊德小傳（二八五六—一九三九）

一生行誼

- 童年與青年（二八五六—一八七三）
- 學習時代（一八七三—一八八五）
- 到巴黎遊學（一八八五—一八八六）
- 開始行醫及建立家庭（一八八六—一八九二）
- 孤立期——精神分析的開端（一八九一—一九〇二）
- 團結與奮鬥（一九〇二—一九一四）
- 戰時與戰後（一九一四—一九三三）
- 精神分析的推展（一九三三—一九三九）
- 在維也納的最後幾年（一八九三—一九三八）
- 移民與死亡（一九三八—一九三九）

譯序

本書原著是由佛洛伊德的三子愛恩斯特·佛洛伊德（Ernst Freud）及其太露西，還有一位友人格魯布利奇·西米提斯（Ilse Grubrich-Simitis）所編著。愛恩斯特在一九六〇年代中期就有一個構想，想以照片、信函、著作等來描述他父親不平凡的一生，這是一件相當艱鉅而繁瑣的工作，在收集、整理的過程中，愛恩斯特不幸於一九七〇年四月去世，而由遺孀及友人繼續其未竟之志，至一九七八年始在英國出版，前後歷時約二十年。

做為一個偉人的兒子，愛恩斯特心目中的父親，必然是跟其他人眼中的佛洛伊德不太一樣的。佛洛伊德自己雖然基於介紹其研究工作的需要，而寫過「自傳」（An autobiographic Study, 一九二五）及「精神分析運動史」（On the History of Psychoanalytic Movement, 一九一四）兩本帶有自傳色彩的著作，但它們都太偏重於「科學面」，照佛洛伊德自己的說法，這根本無法讓人了解「真正的佛洛伊德」。在「夢的解析」（一九〇〇）及「日常生活的精神分析」（一九〇一）裡，佛洛伊德雖然偶而以自己的生活經驗做「例證」來說明他的理論，但這些生活經驗又都是片段的、枝節的，也無法讓人了解「完整的佛洛伊德」。

佛洛伊德在阿諾德·褚威格（Arnold Zweig）想替他寫傳記時，不許阿諾德這樣做，他說：「任何一個寫傳記的人都在撒謊、隱瞞、作偽」。面對父親的這個基本前提，愛恩斯特只好讓父親「自己亮相」、「自己說話」，以照片和私人信函、著作中的蜘蛛馬跡，依年代的先後，剪裁、拼湊出他一生的故事。佛洛伊德在寫這些私人信函時，也許從未想過它們有一天會被「出版」，他像躺在自己診療室躺椅上的病人般，在信裡面「自由聯想」，宣洩他在人生不同階段的期望、疑慮、挫折與狂喜，這正是愛恩斯特眼中的父親，也是瑪莎眼中的丈夫，亞瑪莉眼中的兒子，更是一般人所急欲了解的「真正的佛洛伊德」。

如果不是佛洛伊德年輕時寫給未婚妻的情書，誰會曉得這位不世出的大師，在私底下會認為「每當我遇到一個人時，我知道總有一種難以形容的衝動，會使那個人低估了我」，以及爲了「自然並未以其仁慈之心在我臉上烙下天才的標誌」而「感到苦惱」？這些信件與照片固然能讓我們認識較自然而真實的佛洛伊德，但仍有不足之憾，因爲它們無法呈現生命的連續相，爲了彌補這個缺陷，原書開頭還有一篇由K. R. Eisler所寫的「佛洛伊德小傳」，將佛氏的一生嵌入歷史的時空座標裡，旁述當時歐洲的思潮、文化衝擊及政治事件，使我們能「既見其小，復觀其大」，對這位大師有一較整體的觀照。

譯者在學生時代，相當心儀佛洛伊德。一個人在孤立、徬徨的時刻，總會去尋找一個或幾個

認同的對象、精神的導師，佛洛伊德在不知不覺間成爲我精神的導師之一，就像威爾菲爾所說的：「由我說出這句話，也許是一種僭越」，但即使時至今日，我不得不承認，我對生命的「主題觀點」依然是「精神分析式的」，我爲了了解一個影響我深遠的人而翻譯本書。

王溢嘉 七十四年三月

佛洛伊德小傳



一八五六年五月六日，西格蒙·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誕生於莫拉維亞的弗萊堡（Freiburg），他是雅可伯·佛洛伊德（Jacob Freud）第三任妻子的第一個孩子。值得一提的是，三十四年前，誕生於此地區的另一個小孩，後來也在科學史上佔有顯赫的一席之地，他就是格里果·孟德爾（Gregor Mendel, 1822-1884），現代遺傳學的先驅。他所發現的遺傳基本定律後來就以他為名（即「孟德爾定律」），孟德爾的故鄉海冉多福（Heinzendorf），離佛洛伊德的誕生地僅二十公里之遙。

下面一些事實，將使我們更容易了解佛洛伊德誕生之年在歷史上的座標：達爾文（Charles Darwin）的「物種原始」（on the Origin of Species）在三年後出版，馬克斯（Karl Marx）的「資本論」（Das Kapital）在十一年後出版；哥德在二十四年前逝世，而詩人海涅（Heinrich Heine）——他是後來佛洛伊

德喜愛的作家之一，在二個半月前客死巴黎。此時，面積六十二萬平方公里，人口三千五百萬的奧匈帝國，勢力範圍及於義大利，在年輕皇帝法蘭茲·約瑟夫（Franz Josef）的領導下，是一個穩定的政權。但大約十年後，她開始走下坡，先是失去了義大利行省，後來又在柯尼拉茲戰役中敗於普魯士之手。另一方面，奧地利正開始工業化，大約在佛洛伊德誕生之前十年，裝設了第一條電報線；之前二十年，開始鋪設鐵路。但要在很多年後，維也納才正式啟用電燈。當時，沒有電話，也沒有汽車。猶太人在一八四八年才獲得解放。

日後，當佛洛伊德以八十三高齡客死倫敦時，奧地利已淪為一個小國，且暫時失去了她的獨立性。第二次世界大戰在三個星期前正式爆發，中歐的猶太人被剝奪了他們的公民權，受到迫害與屠殺。整個歐洲已經工業化了，三十年後，人類首次登陸月球。歐洲的文化與文明產生了難以辨認的巨大改變，而佛洛伊德本人以他自

己的方式對此一革命性巨變做了重大的貢獻。

在弗萊堡，莫拉維亞東邊，離維也納二四〇公里，現在叫做普里伯（Pribor）的小鎮裡（現屬捷克斯拉夫），於佛洛伊德誕生那一年有住戶六二八家，居民四、五九六人。佛氏誕生地的那棟房子目前仍在，而且幾乎還保存著原來的樣子。那是一棟簡單的二層樓房，一樓的兩個房間是鎖匠札吉克的店舖，他們在這個地方靠此營生已有五代之久，房子的前門上緣現在還留有札吉克家人的名牌。二樓則是佛洛伊德與札吉克兩個家庭的生活起居空間。稗官野史常能充分反映某些歷史真相，野史告訴我們，鎖匠家裡的小孩是活潑可愛、發育良好、喜氣洋洋的，他可以在工場消磨時間，靠技巧和想像力用薄金屬片做自己喜歡的玩具。

佛洛伊德的祖先原來住在科倫（Cologne，德國西部萊因河畔），因為當地迫害猶太人，而在十四或十五世紀時，向東做漫長的逃亡。十九世



紀時，又從立陶宛向西遷徙，經加里西亞到奧地利來。佛洛伊德的父親卡拉門·雅可伯（Kallanon Jacob，一八三四—一九一五）在一八四〇年遷居到弗萊堡，他是加里西亞小鎮提斯門尼茲地方的人，在十六歲時就和當地的莎麗·康那（Sally Kanner）結婚，生了兩個兒子：伊曼紐（Emanuel，一八三四—一九一五）及非力普（Philip，一八三八—一九一一），兩個兒子都和父親一起來到弗萊堡。一八五二年，莎麗逝世。對佛洛伊德父親的第二任妻子，我們所知不多，只知道她名叫麗貝卡（Rebecca），她一定在婚後不久就過世

，因為一八五五年佛洛伊德的父親又在維也納和亞瑪莉·拿坦松（Amalie Nathanson，一八三五—一九三〇）結婚，亞瑪莉就是西格蒙·佛洛伊德的母親。

佛洛伊德在五月六日黃昏六點三十分時出生，一個禮拜後即行割禮（猶太人割包皮的儀式），他父親特別將這件事記錄在家庭聖經裡。雅可伯

幕時，佛洛伊德在寫給普里伯市長的一封信裡，曾隱約提到這點。

佛洛伊德有七個兄弟姊妹，一個弟弟在他還不到一歲時出生，但八個日後即夭折。最小的孩子亞歷山大（Alexander，一八六六—一九四三）在佛洛伊德十歲時出生，在這兩個男孩子之間，是五個姊妹。

自己的父親則在稍早兩個半月前逝世，這使他覺得自己兒子的誕生有特別重要的含義；除了爲他取個德國名字外，還爲他取了跟祖父一樣的猶太名字沙羅門（Salomon，或寫爲Schlomo，意爲「和平」），以資紀念。

佛洛伊德出生時，母親年方二十一歲，父親則是四十一歲，這種年輕母親與年老父親的結合對某些小孩似乎顯得特別有利，歌德的雙親之間也有很大的年齡差距。在四周都是森林的小鎮裡，一個結構特殊的家庭，可能爲佛洛伊德人生的第一年提供了愉快的生活環境。七十年後，當一座紀念碑在佛洛伊德誕生的房子前面剪綵揭

當雅可伯遷居到弗萊堡時，他跟隨祖父做獲利頗豐的生意，在弗萊堡買進羊毛布，染色加工後，賣到加里西亞，然後又把加里西亞的農產品賣到弗萊堡來。但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這種生意開始走下坡，機器化的紡織品製造業對各地的手工業的威脅日增，而且，弗萊堡已搖身一變成爲繁榮的城市，她位居當時重要貿易路線上的要津，一條穿越廣大鄉間的鐵路從北邊直通到弗萊堡，對小鎮的經濟生活產生粉碎性的後果，小鎮和重要市場間的關係被一刀兩斷。

雅可伯終於發現，他不得不尋求另外的經濟來源。當佛洛伊德三歲時，舉家遷離弗萊堡。他父親先到萊布



吉格（Leipzig），想找個立足之點，但幾個月後，又轉往維也納。於是，在佛洛伊德四歲時，他便和父母還有妹妹安娜（Anna）遷居到維也納這個大都會，而且一住就是七十八年，直到奧地利被希特勒佔領，他被迫流亡英倫為止，他的兩個異母哥哥則早在一八五九年便移民英國。

割禮儀式及雅可伯將此事以希伯來文慎重地記錄在聖經裡，可能使我們認為佛洛伊德是在正統的猶太氣氛中被撫養長大的，但事實不然。佛洛伊德的父親很可能就是在那種氣氛中長大的，而且似乎對自己的信念維持相當長的時間，但在年歲日增後，就

成為一個自由思想者，他在事業上並不成功，幾乎經常靠他人的濟助來渡過難關，但他花大量的時間去研讀希伯來文的猶太經典。

佛洛伊德本人對猶太人的節慶及習俗相當熟悉，但在年輕時即對生活採取非宗教的態度。幼年時，他的嫁姆是一個羅馬天主教徒，經常帶佛洛伊德去作彌撒。他也浸淫於聖經的歷史中，「幾乎在懂得閱讀時就浸淫其中」，這些閱讀就像他在「自體」（Autobiographical Study）中所自承的，對他產生深遠的影響。儘管如此，終其一生，他討厭各種宗教儀式及慶典，是一個熱情的無神論者，但同時，他也從未失去「自己是猶太人」的強烈情感。

佛洛伊德最早的教育得自母親。然後，根據他妹妹的回憶，在父母將他送往一個私立學校（現在還查不出校名）就讀之前，由父親自己教他。當他九歲時，通過入學考試，進入里奧波德史達特（Leopoldstadt）的 Communal-Realgymnasium 學校

就讀，這所學校在一八六七年佛洛伊德還在學時，改名為 Communal-Real-und Oberegymnasium。在八個學年中，佛洛伊德有六年均是班上的第一名。十七歲時，以優異的成績通過結業考試。

我們從保存至今的一封信裡，獲得佛洛伊德在這次結業考試筆試部分的很多資料，他在這封信裡渲染了他的憂懼與成功，及對一些小事的情懷，但這封信真正值得注意之處是一個十七歲少年行文時風格與措辭的優美。他的老師也注意到他這種天份，在這封充滿青年特有嘲諷語氣的信中，佛洛伊德告訴我們：「教授告訴我——他是第一個敢於告訴我政事的人——我的文筆具有詩人赫德美妙形容的「癡頑風格」（idiotic style）——意即，一覽無餘的精確及特色。」這種語文流利洗鍊的早期發展，提高了他對語文及文學的興趣，他告訴我們，他對考試中翻譯威吉爾詩篇及「伊底帕斯王」三十三行劇本的題目可謂駕輕就熟，因為他早在私人閱讀裡

讀過它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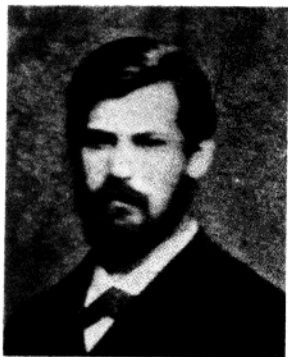
在青年時代，他和布勞思（Heinrich Braun，此人後來成為社會學家）的友誼曾使他興起進入政治學領域的憧憬，而且也幾乎選擇法律做為其終生職志，但在聽了布魯爾（Carl Brühl）的演講後，他始接觸到被認為出於歌德之手的「自然」（Nature）論文，讀後深受影響，而決定研讀醫學。一八七三年秋天，他進入維也納大學醫學院就讀，但卻遲到一八八一年的三月三十日才畢業。朋友和親戚都認為他在五年的修業後，因懶於去參加考試，而在通過結業考試之前多延誤了三年。以當時正常



的修業年限看來，像佛洛伊德這樣天賦優異而又勤勉的學生竟然拖了這麼長的時間才畢業，確是一件不尋常的事。在一八八八年他所寫的一封信裡，我們隱約看出他這樣做的動機：「除此之外，研究的習癖——我在這上面花了大量的心血，以及對學生所能學到的東西、鑽牛角尖的要求及校方的吹毛求疵等感到失望不滿，都成了我研讀教科書的障礙。」這種「研究的習癖」一定在他的延誤畢業裡扮演部分角色，甚至在較早之前即已露出端倪。里斯基（Erna Lesky）認為，在那個時候，佛洛伊德已是「研究者的角色多於學生的身份」。當佛洛

伊德最後發現自己不能再拖時，他立刻以無比的毅力和努力達成他的目標，在短短的十個月內，通過了醫學學位的三項考試，而在準備考試的期間，他還一直在生理研究所從事其他研究工作。

在這個重要關頭，我們必須體認佛洛伊德的父親對他這個兒子一直表現出深刻的瞭解。當他身為醫學生的整個期間，家裡正面臨經濟的困難，他父親在一八七三年之前的一次經濟危機中，失去了他僅有的小量財產，無法再賺錢養家。起先，他希望佛洛伊德能夠經商，這個希望是可以理解的，不過他對兒子的計劃卻從未施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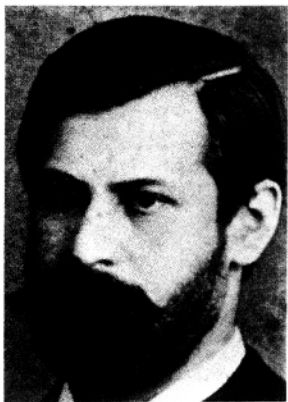


任何干擾，雖然家庭的經濟情況可能不允許兒子上大學，甚至在兒子耽擱畢業的年限時，他也沒有說什麼。

佛洛伊德在動物學教授克勞斯（Carl Claus）的建議下，完成了他第一篇獨立的科學研究論文，在一八八五／七六年間，兩次獲得教育部的獎金，金額為一八〇古爾登（Gulden，舊奧國金幣名），這使他得以在特里雅斯德（Trieste）的動物研究所進行雄河鰻的研究工作，研究結果在一八七七年印成論文發表，這份研究報告有兩點值得注意之處，一般人很難想像以當時笨拙的方法，要解剖四百隻河鰻，並做組織學（以顯微鏡觀察）研究，需要多少毅力與自我訓練。另外，佛洛伊德是第一個觸及「中間性別」（intersexuality）觀念的人，他在此研究報告裡首度提出，河鰻的性別分化可能不是由遺傳物質事先決定的——後人的實驗證明了這點，但當時年僅二十一歲的佛洛伊德和他的老師都沒有覺察到這個觀念可能導致的深遠影響。

顯然是對他的研究工作感到失望——他認為那是一項失敗，佛洛伊德遂於此時從動物研究所轉到由布魯克（Ernst Wilhelm von Brücke）所主持的生理研究所。佛洛伊德在日後說布魯克是影響他最大的老師。布魯克是當時生理學界新起的「反生機論」（Antivitalistic school）的一個代表人物，他和 Hermann Helmholtz 及 Emil Du Bois-Reymond 等幾個學界領袖，嚐試以物理化學力量的作用來解釋所有的生命現象。

一八七六年到一八八二年，佛洛伊德在生理研究所待了六年時間，從這個時間他所做的神經組織學重要研究看來，他實已跨入了即將在這個領域大放異采的門檻，但他却放棄了，因為他墜入瑪莎·伯內斯（Martha Bernays，一八六一—一九五一）的情網，在兩人首次見面後不久，佛洛伊德就在一八八二年的六月和她訂婚。他看不出自己在生理研究所有迅速昇遷的機會，而謀求經濟獨立却是當時最優先的一件事，所以他開始為開



業行醫做準備。以後到一八八五年八月，他又花了三年的時間在維也納大學醫院（Vienna General Hospital）接受臨床訓練。但這三年也不是全然投注在醫院工作及臨床經驗的獲得上，他照樣撥出時間做科學研究，而且在醫院的實習結束後，仍繼續他的研究。除了腦解剖及對住院神經疾病患者的臨床研究外，我們還必須在此一提所謂「古柯鹼」（cocaine，一名可卡因）研究時期」。

一八八四年四月，佛洛伊德開始研究這種藥物，古柯鹼樹葉中的一種活性成份，印第安人一直用它來緩和肉體的痛苦。佛洛伊德花了一大筆錢

始從穆克藥廠弄到一克的古柯鹼，旋即從自己所做的實驗裡發現古柯鹼的復甦作用（*reinvigorating effect*），也從朋友的身上觀察到它的作用，不久他就寫了一本小冊子，在書中說明古柯鹼作用的一般研究。他現在所完成的研究階段，並計畫做更進一步的實驗等等。這本小冊子寫於一八八四年六月，兩個月後，他到旺茲別克去會晤未婚妻瑪莎，四個禮拜後才回到維也納，但此時，他的同事科勒（*Carl Koller*）早著先鞭發表了古柯鹼對眼睛具有麻醉作用的轟動性發現，柯勒在一夜之間成為國際上的知名人士，因為他的發現使後人可以在無痛的情況下進行眼部手術。當時，佛洛伊德焦急地渴望能迅速獲得名聲，好早日結婚，並將家人從經濟困境中解脫出來；這次他眼看就要實現自己的雄心，但卻在最後一刻睜眼看著成功從身邊溜過。

古柯鹼還帶給他另一個沉重的打擊，他的朋友也是他的老師弗萊歇爾·馬克松（*Ernst von Fleischl-*

Marxow），曾在布魯克的生理研究所擔任助手，染上了嗎啡毒癮；緣於他在解剖一具屍體時，不小心受到感染，而長出痛苦不堪的神經瘤，這種神經瘤無法手術切除，會一直在他被截斷的姆指殘餘部分滋生。佛洛伊德原先希望藉古柯鹼來戒斷朋友的嗎啡毒癮，想不到古柯鹼却導致更厲害的毒癮。兩年後，佛洛伊德受到公開的指責，說他在酒精與嗎啡之外，又為人類添加了「第三個天譴」。

在此一時期，還有兩件值得一提的事。第一件與佛洛伊德的學院生涯有關，第二件則為他的科學研究帶來明確的轉向。一八八五年一月廿一日，佛氏申請在維也納大學開一個神經病理學「講座」（*Dozentur*），「講座」在當時被視為是年輕醫師所能追求的最高目標，申請者在希望獲得此項尊榮之前，必須先有優於常人的表現。佛氏在他的老師布魯克及諾斯那吉爾（*Hermann Nothnagel*）、梅勒特（*Theodor Meynert*）教授的支持下。諾斯那吉爾是當時維也納

大學醫學院內科的一位偉大專家，在一八八二年應聘至維也納，同年起，佛氏在他的內科部做了六年的臨床助手。梅勒特，佛氏在日後提到他時說：「偉大的梅勒特，我以深深的敬意跟隨他的腳步前進」，他是一位腦解剖學專家及精神科教授，佛氏曾在精神科做了五個月的住院醫師，並在實驗室從事重要的腦解剖學研究。得多助，佛氏很快地解決了申請講師所牽涉到的種種複雜情況，而在同年九月五日，離提出申請才半年多一點，院方就同意他的任命。佛氏未來的生涯似乎得到了安全保障，此項任命保證他可以一邊做收入頗豐的開業，同時也允許他對將來的學術進展抱持希望。

但稍後不久發生的另一件事，却為他的一生帶來預想不到的轉變。在一八八五／八六這個學年裡，從一八六五年就設立，每年一個名額的「大學朱比利旅行獎學金」（*University Jubilee Travel Scholarship*），剛好輪到醫學院，佛氏提出申請，結



果再度得到布魯克的強力支持，而使他從三個申請者中脫穎而出。

於是從一八八五年十月到一八八六年二月，佛洛伊德遊學巴黎，到知名的 Salpêtrière 醫院見習，沙考（Jean-Martin Charcot）——他可能是當時最偉大的精神病理學究——正在該院從事研究及授課。我們很難說是沙考這位醫學界改革者及天才的迷人性格，抑是他的教誨，留給佛洛伊德較深的印象。但不管怎麼說，沙考最後成功地使當時極普遍的一種精神官能症——歇斯底里（hysteria），轉變成爲值得做科學性探討的一個醫學課題。在此之前，歇斯底里幾乎

一成不變地遭到不信任甚至恥辱的看待，但沙考向大家顯示，催眠能瞭解其真相的本質，而首度將令人困惑的、複雜多樣的歇斯底里症候學納入可以理解之臨床法則中。他在大庭廣眾之下，將病人催眠，以人爲的方式讓病人產生歇斯底里症狀，爲研究這些症狀的根源提供了可行的途徑。

當時的巴黎，爲佛氏開啟了一個新世界。我們可以說他在沙考的影響下，發現了神經病態的心理層面，這點在不久之後即成爲他唯一的興趣。當一八八五年六月，他獲得意想不到的旅行獎學金等，他在寫給未婚妻的信裡文情並茂地說：「真是太好了！我將……戴著一個巨大的光環返回維也納，然後我們立刻結婚，我將治好所有過去無法治療的精神疾患。」但結果事與願違，當他於一八八六年十月返回維也納之後，以「男性歇斯底里症」爲題，對醫學會發表演講，闡釋沙考的學說時，不但沒有獲得他所希望的成功，反而遭到強烈的排斥，當時大家認爲精神病人是無法治療的。

回到維也納後，佛氏開始在拉薩烏史翠斯（Rathausstrasse）地方懸壺濟世，每個禮拜有三天上午到卡索威茲（Max Kassowitz）教授的小兒科門診擔任神經科醫師。六個月後，他總算如願以償和瑪莎舉行婚禮，新娘的一位孀孀慷慨地資助金錢，使這對新人能擁有自己的一棟房子。

能和瑪莎結婚這件事，對佛洛伊德來說，似乎代表一項重大的勝利。起初，每件事看來似乎都在暗中破壞他們訂婚的愉快結局。瑪莎的故鄉在德國漢堡附近，出身德國猶太人的書香世家，她的祖父夏參·以撒格·伯內斯（Chaaham Isaac Bernays）是漢堡猶太民族會的首席牧師，在一八四一年的猶太反擊運動中扮演突出的角色，他受過良好的教育，是謝林（Schelling）哲學的追隨者，雖然他反對漢堡猶太民族會中形勢頗強的改革運動，但却是第一個以猶太母語佈道的正統猶太牧師。瑪莎的兩位伯父雅可伯及米契爾也是知名之士，雅

可伯是伯恩大學的古典哲學教授及圖書館館長，他對古希臘哲學家有專精的研究，所著 *Die Grundzüge der verlorenen Abhandlungen des Aristoteles über die Wirkung der Tragödie* (一八五七年) 一書頗受時人注目。米契爾則受過洗，在慕尼黑教授德國文學史，他的教授頭銜是巴伐利亞大公國路德威格二世特別頒贈的，最知名的著作是 *Zur Kritik und Geschichte des Goetheschen Textes* (一八六六年)。

瑪莎的父親伯曼 (Berman) 於一八六八年來到維也納，十年後突然逝世，家庭經濟頓時陷入困境。她的母親艾梅琳 (Emmeline) 來自斯堪地那維亞，是一個受過高等教育、聰慧的婦人，跟他丈夫一樣，也是個正統的猶太人。讓佛洛伊德感到極度苦惱的是，她在丈夫死後堅持帶女兒返回漢堡，結果使得訂婚的一對戀人飽受數年的離別之苦。

以當時的習俗觀之，佛洛伊德的

選擇可以說是極違反慣例而又複雜的，他所追求的女孩子擁有顯赫的家世，從傳統及社會階級的觀點來看，女方的眼界可能相當高，但同時却又無能給予求婚者體面的嫁奩。不過就像他在其他生活領域裡的很多表現一樣，佛洛伊德義無反顧地追求瑪莎。

婚後，一對新人搬進蘇恩豪斯區新建的一棟公寓，這幢公寓建於一八八一年燒燬的「環形劇場」廢墟上，當時有三百人罹難，罹難者的家屬目前止靠蘇恩豪斯公寓的租金渡日。社會盛傳該公寓因還留有昔日悲劇的記憶而經常鬧鬼，但佛洛伊德並不為這些迷信所動。

結婚代表佛洛伊德一生中某個決

定性階段的結束。長達四年多的訂婚期可能是他所面對的最艱難考驗之一，在這段期間裡，他和未婚妻異地相思，手頭經濟拮据，前途茫茫，同時又接受心力交瘁的醫學訓練，研究艱深的科學問題，但如今已雨過天青，他必須收拾飽受失望蹂躪之心，奮起所有的意志力，以免在開始邁向成功之路之前被這些壓力所擊垮。現在，他終於建立了一個家庭，獲得大學講師的職位，他的聲望贏得了同事們的尊敬，而開業也得到了比預期更多的收入，前四、五年的哀傷與困厄似乎得到了豐碩的報償。一八八七年，他



的第一個孩子誕生了，隨後數年，又陸續生了五個。他的生活似乎正沿著一條明晰而可以預期的途徑前進著，但下面一些際遇又使得他的生活為之改觀。

剛開始時，他似乎要放棄早年的雄心壯志，而安於開業以照顧他的家庭。因為他專攻神經病理學，所以病人也以神經病患為主，在一年半多的時間裡，他用普遍被醫學界採用的方法來治療這些病人，譬如電療、治療浴等，但卻經常無法得到教科書裡所說的症狀改善或痊癒。因為如此，佛洛伊德最後改用催眠術，剛萌芽不久的催眠術雖然被很多醫學權威所排斥，但在當時已成為一種流行的療法。醫師讓病人進入催眠的恍惚狀態中，然後給予病人各種可能涉及症狀的暗示，希望藉此來消除精神官能症性的障礙。當這種方法確實在很多病人身上產生令人滿意的療效後，佛洛伊德開始認為，它在另一些病人身上的失敗及症狀復發，可能是因為他催眠技術不當的關係，所以在一八八九年，

他到當時動力療法的重鎮南西（Nancy）在「南西學派」（Nancy School）的創始人黎貝奧特（A.A. Liébeault）和他的得意弟子伯罕（H. Bernheim）的門下學習，精研催眠技術。但這些努力却沒有什麼成果，治療的成功率仍然不高。在將病人催眠後，暗示他沒有病，但病人一醒來却又堅稱自己有病，看起來還是徒勞無功。

就在這個時候，與佛洛伊德有長久情誼的一位朋友，突然開始在佛氏的生命中扮演起非常重要的角色，他就是布勞爾（J. Breuer），布氏在當時可能是聲望最高的一位內科醫師，他也在維也納開業。當前幾年佛洛伊德正陷於情感危機與物質匱乏的雙重困境中時，熱心而慷慨的布勞爾一直給他忠告和經濟上的支援。此外，布勞爾亦是一位傑出的研究者，他對自律神經控制呼吸及對平衡器官的研究工作，使他被選為維也納科學院的通信院士，我們可以說，布勞爾在做了一個學者、一位醫師及一個人三方

面都是很特出的。

布勞爾治療一位患有非常厲害的歇斯底里症狀的婦人，已有數年之久，這個女病人在醫學文獻裡被稱為「安娜」（Anna O），安娜當然是假名，現在我們知道她的真名叫伯莎·帕爾罕（Bertha Pappenheim），後來成為一個爭取女權及社會福利的健將。

在無意中，布勞爾所做的一項觀察導致了一個重大的發明：在催眠之下，病人能回憶起當初導致她發作歇斯底里症狀的整個情境，而且在表達了當時被壓抑下去的情緒後，她的症狀就消失了。在較早之前，布勞爾已

